



English

下载中心

首页

网站地图

关于 IWEP

研究课题

研究人员

研究成果

数据库

出版物

媒体报道

研讨会/讲座

时 评

[HTTP://WWW.IWEP.ORG.CN](http://www.iwep.org.cn)

《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

今后五年的中国外交需要智慧与勇气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王逸舟

先概括一下我所认为的中国外交的进步和不足，然后谈两个相关的问题。

总体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我们的外交工作及其体制像国内各个领域情况一样，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了不起的进步。首先，中国人对国际安全环境有了越来越积极乐观的认知，此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焦虑心理和造反意识，逐渐被更加自信、开放与合作的态度所替代。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中国更加乐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其作为国际成员的意识得到明显增强。第三，相对于过去而言，现在的外交领导人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针，社会和公民个人日益成为国家外事服务的中心目标。第四，社会的参与逐渐增多，外交决策过程朝着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推进。最后，整个外交的学习过程和制度创新在逐渐加速，中国外交的活力得到更多机制的激励和保障。总体上观察，中国外交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转型或者说革命，从一个比较内向、防御性的形态，转向更加开放自信和负责任的角色。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发展速度和文化底蕴，这种进步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然而，看到成绩和进步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存在的不足和困难。一个方面是外交理念与实践过程结合不够，操作性不强。各位可能马上会联想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等口号。这些思虑深远的设想，却由于缺乏论证、解释不够以及政策不配套等原因，或者因为无法应用到解释具体的难题和挑战上，也被很多人视为过于理想化、太遥远的东西。另外一点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制订过程对于外部世界的敏感度，虽然较历史上和前一时期有大的增强，相对很多国家来说仍不算高。再次，围绕涉我主权的摩擦不断、谈判进展缓慢，说明这个问题对中国有特殊的难处和微妙。此外，曾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服务之重心的经济发展优先性，在转型时期面临了更多的任务、更复杂的关系。还有，我们外交体制仍不够成熟，比如讲部门之间的协调通气不够，中长期战略设计和主动倡议比较少，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了解和信任度与决策部门和操作层的评价有不小的反差(所谓“外交公信力”问题)。最后，现有外交资源的有限与层出不穷的涉外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体制面对的突出挑战。

上述观点在前一期《外交评论》有专文讨论，这里就不展开了。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我想补充两点看法：

第一，我国现有的外交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和发展余地，各位师生和研究人员应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直面新时期中国外交遭遇的重大难题和挑战。这里想了几个题目作为例子：(1)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一员，也作为一个不能不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大国，如何坚持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面对一些“问题国家”和麻烦地带(尤其是与我利益有关的某些国家)，既坚守主权原则、抵制少数西方强权蛮横霸道的干涉行径，又能积极、及时和妥善处理需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出面介入的某些事态(提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创造性地坚守不干涉准则，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发挥国际作用)?(2)看待和处理复杂微妙又极端重要的大国关系时，怎样更好地推出有想象力和长久效力的新举措，突破国家关系中的一些“瓶颈”?举例来说，中国和日本目前都承诺要建立和推进“战略互惠关系”；那么，怎样使这种高层政治承诺落到实处，在顾及对方重大关切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尤其

是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东海划界问题和涉台分歧问题)?(3)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中长期方案方面,在更有技巧和更有善意地接纳国际NGO的角色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竞争和核扩散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方面,我们中国人能否处在更加开放和积极的位置,在一定时候提出类似20世纪70年代马耳他建言的“海洋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以日本城市命名的控制温室效应的全球协议“京都议定书”、挪威倡导的有关中东和平进程的“奥斯陆协议”等关乎人类福祉的行动纲领,使我们所说的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等不止是中国官方的口号,而成为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多次指出,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处理好“保障自身发展”、“维护领土主权”、“承担国际责任”三种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复杂艰难的长期任务;在处置上面提到的难题时,都会遇到三者之间的棘手矛盾,都需要大胆的想像力、真正的外交和战略艺术。过去的实践表明,虽然总体上我们的外交应对是成功的、有效的,但它更多依靠的是政治上的决断和外交家的努力,而理论家和学术界的贡献度很少,尤其是前瞻性、中长期的开拓性探讨比较缺乏。

第二,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特殊内政,但它同时是涉及方方面面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大难题。我觉得,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讲,前些年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虽然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大方针,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具体落实办法,尤其在把握战略态势上,主动权始终不在大陆一边,某些举措的效果并不理想,台独势力因此钻我们的空子、活动愈发猖獗,台湾民众对大陆主张的认同度也有所下降。十六大以来的这段时期,不利局面得到了扭转,在我看来,关键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有新的谋划,强调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推动“和平与发展的两岸关系”,主动邀请连战等岛内政治人物来访,把“创造性维护现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同时增加了国际间的努力(如与美国协商遏止陈水扁急独势力的铤而走险)。然而,要看到,有了正确的方向,不等于有了好的行动纲领。究竟能否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到的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培育出中央所期冀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岸关系”气氛,在台湾新领导人上台后(不管是马英九还是谢长廷,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主动与之接触,打破目前的两岸政治僵局,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注意并照顾到台湾民众参与国际活动、享有更大自主性的意愿,与此同时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引而不发,有张有弛地对台独势力和外部重大威胁保持压力(如有理有利有节、得国内民心又得国际理解的军事安排)?实在地说,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绝非易事,很多问题是在现有的框架和思路内无法解决的,尤其只从涉台事务的狭窄视野是根本不能容纳的;而且,它不止意味着政治上有新的表态和决断,更要求有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规划设计和案例研讨,如对国际上各种做法、安排和建议(包括联邦国家和邦联体的各式法理形态,海外华人学者和思想家的不同建言)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历史上各种经验和论述的梳理分析(从古人有关“权”、“术”、“势”的哲理思想,不同“分”与“合”局面的教训,到近代孙中山先生的某些设计,直至近期台湾方面学界和媒体的某些建议),对台海局势这枚“棋子”在中国争取战略机遇期、坚持和平发展、倡导和谐世界之“大棋盘”上的布局安排,等等。做好这类研讨,不仅需要涉台决策部门有大的胸怀,有“纳谏”的气度,有实际的安排,更要求我们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有大的眼界和政治判断力,有真正的理论勇气,尤其有扎实的研究能力。在我看来,台湾问题妥善处理与否,是我们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基础上迈向更大进步阶段的前奏,是考验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试金石,是中国成为21世纪新型世界大国的关键。由此考量,学术界的投入与付出是值得的,我想借此机会向中国外交学界和理论工作者们做出特别呼吁。

(本文系作者在2007年12月5日外交学院“2007年国际形势与思考”论坛上的发言要点)

推荐好友

相关文章

- 邵峰 奥运火炬传递凸显和谐世界外交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4月29日 (2008-5-6)
- 增进互信:胡锦涛主席出访美国、沙特等五国(2006年) (2008-4-17)
- 视线:春天的启航 CCTV.com[世界周刊]2008年3月16日 (2008-3-20)
- 薛力 “谈判的时代”与中国外交 《环球时报》2008年1月29日 (2008-2-19)
- 王逸舟 中国外交三十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 (2008-1-16)

本站的署名文章均属作者本人的观点。希望转载时,请事先与我们联系。

院首页

网站声明

会员登录

联系我们

下载中心

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opyright (C) 2002-2008 中企动力提供技术支持 请使用 1024*768分辨率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6063 传真:010-65126180 联系本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备06059776号